

反思漢學

——張隆溪教授專訪

● 梁建東

張隆溪，北京大學西語系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受聘於美國加州大學河濱校區，任比較文學教授。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研究範圍包括英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西文學和文化的比較研究；2009年獲得瑞典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榮譽，成為二百五十多年來第三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主要中文著作有：《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闡釋學》、《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論》、《同工異曲：跨文化閱讀的啟示》、《五色韻母》；英文著作有：《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s》等。

2009年11月26日至12月3日，張隆溪教授應蘇州大學文學院以及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邀請做了三次精彩講演，涉及中西比較文學、錢鍾書的治學方法，以及自然和風景觀念的形成。張教授在蘇期間，筆者有幸伴隨其左右並有數次愉快對談，收穫頗豐。為保持原汁原味，現在整理出來的文稿為談話實錄，未做多餘增減。本文是多次談話中的一部分，主題為對海外漢學的深刻反思。本文已經由張隆溪教授審定。

按：正文□為梁建東提問，◆為張隆溪就相關問題所做的回應。

□ 您在美國的時候與漢學家接觸多嗎？

◆ 我出國比較早，1983年就出去了，在出國之前我對西方的漢學並不了解，幾乎就沒有看過任何漢學家的

著作，倒是看過一些錢鍾書先生批評漢學家的文章和書評，僅此而已。到了哈佛之後我認識了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以及其他一些漢學家，但我沒有上過東亞系的課，

漢學的特殊性就在於中國文化在西方的特殊性。對於西方而言，研究西方的文化傳統是學術的核心和主流，而研究中國文化即漢學，不是中心和主流的學問。有些人不很懂中國，居然也可以評論中國。

他們中有些人可能對我有點意見，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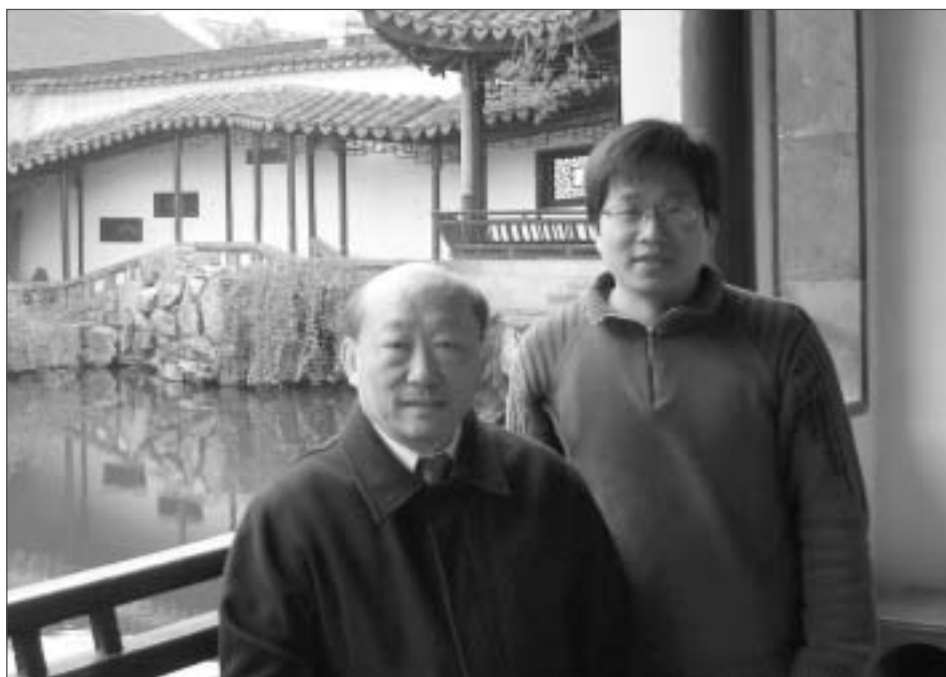
我做研究生的時候在普林斯頓見到了孫康宜，她讓我去耶魯，在她教的課上講一次。我後來去了她家，其先生也姓張，與我同姓，我們聊得很高興。她先生提議說我們做結拜兄弟，孫康宜後來還常常與別人說我是她的弟弟，我們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誼。另外，在哈佛就認識的艾朗諾 (Ronald C. Egan) 教授，是古文和學問都很好的漢學家，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在美國十多年，認識的人不少，其中研究中國的學者當然很多。張光直先生的高足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在哈佛是同學，也是老朋友，現在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任教。現在於耶魯任教的還有蘇源熙 (Haun Saussy)，他是比較文學教授，也研究中國文學，和我從研究生時代就是朋友。

□ 漢學在西方一直處於學術體制的邊緣，它的特殊性在哪裏？

◆ 漢學的特殊性當然就在於中國文化在西方的特殊性。對於西方而言，當然研究西方的文化傳統是學術的核心和主流，而研究中國文化即漢學，不是中心和主流的學問。於是，有些人不很懂中國，居然也可以評論中國。一個法國的理論家如果不懂英文卻對英國文化大加評論，不懂德文卻大肆評論德國文學，這都是不可想像的。可一個西方思想家，像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完全不懂中文卻可以做出關於中國文字的大結論來。

老一輩的漢學教授，有些不會講中文，也可以做終身教授。但你能想像在美國大學裏，一個研究法國的美國教授不會講法語，研究德國的教授不會講德語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這背後其實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之間不平衡的關係。

當然，這種情形隨着中西交往愈來愈便利，已經有很大改變。很多研究中國新一代的學者們，中文都講得很流利。我認識的漢學家朋友，就有很多這樣的人。



筆者與張隆溪教授合照

□ 很多國內學者在從事研究的過程中，往往會受到一些西方漢學家的強烈影響，面對西方漢學研究成果的大量譯介，我們該如何保持清醒的頭腦？

◆ 在改革開放之前，也就是文革或更早的時期，我們對西方的漢學是完全不了解的，而且也無暇顧及，當時只覺得西方的研究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或者認為漢學都是資產階級思想。這是當時的一種偏見，可現在另一種傾向又開始出現了，好像凡是外國人寫的書、做的研究就一定是好的。我覺得這兩種極端都是不可取的。國內很多人其實完全不了解國外漢學的狀況，也完全不了解西方學者的中國研究的具體情況，這是一種理解上的缺失。

在很多時候，西方學者從他們的角度來討論中國問題，對我們確實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因此也有了了解的必要；但在另一方面，很多中國人真有些崇洋媚外，以為凡是洋人說的就是對的，這樣的態度完全是錯誤的。

說實話，漢學研究存在着不少問題。當然不是所有的漢學家都很糟糕，也有很好的漢學家，但總的來說，漢學在西方本來就不是學術的中心，它一直處於邊緣位置。比較一下，在中國國內最重要的學問是研究外國的哲學、文學、歷史，還是研究中國自己的哲學、文學和歷史？研究外國的思想固然重要，但它會是中國學者最主流、最中心的研究領域嗎？同樣，在西方，西方學者當然首先是研究自己的哲學、文學和歷史，這才是他們學術的核心，而漢學是在西方研究非西

方的文化，自然就會處於邊緣的位置。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漢學家當中，並不是每一位都很優秀。中國的語言、文字、文學都不是輕易就能掌握的，尤其是古文非常難，西方漢學家首先必須得花很長的時間和精力來學習漢語，學習古文。這樣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他們當中很多人反而對西方自己的文化傳統不太了解。漢學家們常常把中國文化當成是獨特無「比」的，因為他們只知道這些。雖然他們是西方人，但不一定就很懂得西方的傳統。就像身為中國人，不一定就很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一樣。還有就是西方人長期以來都非常強調文化之間的差異，很多漢學家往往深受這種偏見的影響，就會自然而然地把中國說成是與西方完全不一樣的文化。

相對而言，漢學家是西方人當中最了解中國的，可他們卻常常把中國描述得非常奇怪。宇文所安說中國的語言是自然的，中國詩的意義不是通過比喻來表達的，詩人展現的是一個親身經歷的世界。在他看來，「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這樣的詩句，是杜甫真站在那道河岸上寫的^①，而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描繪的倫敦城，卻並不一定是他在某個特定時間、地點見到的實景^②，因為英文詩的語言並不指向歷史現實，而是引向現實之外，曉示的是超越經驗世界的某種意義。我可以問，那麼「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是不是杜甫真覺得自己變成一隻鳥了呢？你看，他這樣的解釋方式和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語言沒有語法、中國人沒有抽象思維的觀點，其內在邏輯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西方學者從他們的角度來討論中國問題，對我們確實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因此也有了了解的必要；但在另一方面，很多中國人以為凡是洋人說的就是對的，這樣的態度完全是錯誤的。

所以，漢學家的問題其實很大。我對他們往往也有批評，我們確實應該介紹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文學、文化的研究，但與此同時，更重要的是我們中國學者應該首先充分理解自己的傳統，然後站在我們自己的立場上去與他們進行平等的對話。我們當然不必一味地反駁他們的觀點，處處與他們唱反調，而是要仔細研究他們究竟在甚麼地方對我們有啟發，在甚麼地方又是錯誤的。說實話，他們對中國傳統典籍的掌握是很難與中國學者相比的，不要老是覺得洋人講甚麼都是對的，這是最沒有出息的想法和態度。

我們應該介紹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文學、文化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學者應該首先充分理解自己的傳統，然後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去與西方進行平等的對話，仔細研究他們究竟在甚麼地方對我們有啟發，在甚麼地方又是錯誤的。

□ 您這一次來蘇州給了我很多很棒的啟發，您說漢學家不一定懂西方的文化，這是我聽過的最過癮的一句話。

◆ 我說的是實際情形，不是為了情緒上感覺痛快。說實話，很多漢學家花了很大力氣才把中文掌握好，就不太可能對自己的文化有多深的了解。我之所以很尊敬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就在於他不但熟悉中國文化，而且對西方文化也非常了解。他是猶太人，對猶太傳統了熟於心；除此之外，他對西方自韋伯以來的社會學理論也很有研究。他的中文雖然不見得處處都把握得很好，但他在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思想時，其非常深厚的西學基礎為他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他之所以能超過其他許多漢學家的原因就在這裏。

□ 這其實是破除了一種長期以來的迷信。

◆ 我們並不是要輕視漢學家，而是要把自信建立在自己的學術努力之上，最關鍵的是我們要對西方和東方都有了解才行，做比較研究這是缺一不可的。

□ 〈走出文化的封閉圈〉 (“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應該是您比較鮮明地批評海外漢學的文章之一^③，為甚麼會有這樣一篇文章？

◆ 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美國一份刊物《近代中國》 (*Modern China*) 的編輯給了我劉康的一篇投稿，讓我提供評審意見。我一開始拒絕了。我說我和劉康一樣都是從大陸出來的，有大概相同的背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然後才出國的，劉康當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也剛剛開始工作，所以我不太願意批評他。這個編輯很不解，他說我的這個解釋聽起來是很中國式的理由，在他們美國人看來，只要不同意某個人的觀點，就應該直接批評他，不能因為自己與對方都是同一國家的人或有着相同的背景，就不做批評。沒有辦法，我只好答應了這個編輯的要求，並把我的批評意見寫成了一份報告。後來《近代中國》收到幾篇論文，決定與劉康的文章一起發表，並要我也寫一篇。這就是我寫〈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一文的緣由，我在那篇文章裏對劉康有一些批評，但那只是文章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批評了宇文所安對中國文學的看法，還討論了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對魯迅和中國近代文學的意見。

□ 為甚麼要用“Ghetto”來比喻西方的漢學界？

◆ “Ghetto”原來是指歐洲城市裏猶太人的居住區。在基督教佔據主導地位的歐洲城市裏，猶太人的聚集區往往是孤立而且處於邊緣地位的。但我在文章裏使用“Ghetto”是取其引申的意義，所以譯成「封閉圈」。確實，我所講的“Cultural Ghetto”主要批評的就是西方漢學，其實我這種說法也得罪了很多漢學家。為甚麼要這樣講呢？因為我覺得漢學界的研究者不太願意與其他領域的人進行交流，同時他們又老是把中國文化講得非常獨特，好像與西方沒有甚麼關係似的。這樣一來，他們反而就在西方學界裏把自己邊緣化了。

西方學界主流肯定是研究自己的文學、歷史和哲學，而漢學家們把東方講得那麼神秘、難解，好像只有他們才懂似的，於是就一直是自說自話，這樣反而使得外界對他們一點興趣都沒有，漢學就這樣成了一種自我的封閉圈。我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文化的封閉圈」的。有一些漢學家很不高興我這種說法，但也有些人認為我講得有道理。

□ 宇文所安先生對中國當代詩歌的評價不太高，您對他的這種看法進行了批評，這是當代海外漢學界裏的一個重要的事件。

◆ 其實當時不光是我一個人批評了他，李歐梵、奚密都曾經批評過他。宇文所安對北島的評價是不公平的，而且他的這種觀點與他對整個中國詩歌的看法是有關聯的。在他看來，中國詩歌只能是唐朝的

詩，現代的中國詩就不是中國詩。他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他顯然把中國看成了一個凝固在古代的中國，而現代的中國就不再是中國了。所以，我對他的批評還不光是針對他對北島的評價，同時也針對他對整個中國詩歌的看法。李歐梵在批評他的時候說過一句很有趣的話：「不知道唐詩如果用唐朝時的語音唸出來，會是甚麼樣子？」他其實是在諷刺宇文所安連中國話都講不好，怎麼會知道唐詩由唐人讀出來是甚麼樣的呢？

□ 您在這篇文章裏批評了劉康把政治性的文化批評過份地運用到關於中國文學的研究當中，一些海外華人學者的身上確實存在着這樣的情況，與此同時他們對文學本身的問題不太重視，對西方文學的深入研究也相當缺乏，對此我們應該反思的地方在哪裏？

◆ 這其實已經是一種普遍性的現象，而且不是現在才這樣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很複雜。西方文學本身有一個內容豐富、歷史悠久的傳統，中國去西方留學的學生要想進入其研究的中心並不是很容易的事，相對而言，在海外研究中國文學或文化要容易些；此外，政治性的文化批評多少也迎合了西方學界對中國學者的期待視野。當代西方的一些學者在研究西方文學、文化時確實會有很強的批評意識，他們的政治性動機也非常明顯，但其基本的目的還是在於維護西方特有的文化、政治生活。西方的學者批評自己的傳統文化或現代生活有其內在的必然性，比如說他們對現代性的批評、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對環

漢學界的研究者不太願意與其他領域的人進行交流，他們把東方講得那麼神秘、難解，好像只有他們才懂似的，反而使得外界對他們一點興趣都沒有，漢學就這樣成了一種自我的封閉圈。

境問題的批評，諸如此類，但問題本身是西方的問題，這些批評也只有西方語境下才具有積極的意義。可是，換了一種語境之後，也就是說，當我們把這些批評搬到中國來的時候，它們的積極意義在哪裏、現實意義又在哪裏？

西方的學者批評自己的傳統文化或現代生活有其內在的必然性，這些批評只有在西方語境下才具有積極的意義。當我們把這些批評搬到中國來的時候，它們的積極意義和現實意義又在哪裏？

- 在西方獲得成功的與中國有關的藝術作品，從小說《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到電影《臥虎藏龍》，甚至動畫片《花木蘭》(*Mulan*)、《功夫熊貓》(*Kung Fu Panda*)，再到歌劇《圖蘭朵》(*Turandot*)，它們都為西方大眾所熟知，但在內容上卻與中國的現狀無關，仍然是在借助「異國情調」製造關於中國的不真實的「神話」，這種狀況和過去比似乎沒有甚麼變化。普通的西方民眾是不是也深受各種偏見的影響？

- ◆ 很多時候確實如此。在2008年7月份，有一位美國作家莫尼斯(Nicole Mones)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了類似的問題^④。她寫過關於中國的小說，比較成功。她1970年代就在中國生活，先是做生意，後來才開始寫小說。她在那篇文章裏說自己在中國做生意的時候，也就是在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很多地方都在修築新樓、工廠，中國人都提出要帶她去看這些新建的高樓，但她卻不想看。她喜歡的是拿着相機去農村，拍水田裏犁地的水牛和插秧的農夫。她那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是，美國人或西方人想看的中國其實還是他們自己想像中的中國，而不是現在的中國或中國的現實。這些年

來中國所取得的高速發展，高樓、大廈、工廠、馬路這些新的建築西方人都不想看，他們想要看的是那個正在迅速消失的中國，那個過去的、落後的中國，甚至恨不得看到中國人還拖着長辮子、裹着小腳，他們就想看這個。

西方普通民眾的心態基本如此。前些年在美國很火的一些關於中國的影視作品，比如你說的《臥虎藏龍》在西方的票房非常高，可是中國人自己並不見得有多麼喜歡。這些電影其實沒有甚麼了不起的，我本人就不喜歡，覺得得奧斯卡獎似乎有些不值得。不過話又說回來，奧斯卡獎也不見得就都那麼好，而且《臥虎藏龍》比甚麼《無極》當然又好得太多了。外國人竟然喜歡得不行，覺得充滿了異國情調。可見，中西觀眾中確實存在着不同的口味，西方一般的觀眾與中國一般觀眾所接受的東西的確有區別。在西方很受讀者追捧的一些小說，比如那部《巴爾扎克與小裁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我並不覺得有那麼好；相反，很多中國人覺得好得不得了的作品，在西方卻無人問津。這種接受差異是一個不能被忽視的現實，而在我看來，這一現實的真正原因就在於中國和西方在文化上的不平衡。

- 文化上的不平衡是不是也深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 ◆ 所謂「文化上的不平衡」，當然跟中國近代以來整個歷史有關。我們一般的大學生或一般的讀者對西方文學、藝術的了解，遠遠超過普遍的西方大學生對中國文學、藝術的了解。我們誰不知道莎士比亞，誰不

知道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 可是有多少西方學生知道李白、杜甫呢? 更不要說陶淵明、蘇東坡了, 這些名字他們可能聽都沒有聽過。實際上, 正是政治、經濟力量上的不平衡造成了這種文化上的不平衡。我們願意了解西方和西方的現實, 而一般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 還是凝固在過去的、老舊的、異國情調的中國。

現在上海、北京的機場比巴黎、倫敦的還要現代得多, 即使是國內一些小城市的變化也非常大。中國人早已不再拖着長辮子、裹着小腳了, 這些完全不是普通西方人所能想像的。我相信隨着中國的政治、經濟的發展, 在國際上逐漸擁有了更多的空間, 西方人肯定會對中國當代的文化產生興趣, 就像1970年代的情形那樣, 西方人對日本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 都去學日文那樣, 這個道理其實是一樣的。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之後, 西方人就開始覺得這個國家非常重要, 所以就想去了解日本文化。現在中國也開始逐漸強大, 學習中文的人也愈來愈多。隨着人數的增長, 文化不平衡的情況就會發生改變。

當然, 我們不能強迫西方人來學習中國文化, 我們也不能請求他們來學習中國文化, 他們真正要來學習的話, 就得是自發的。從來沒有人拿着槍逼着中國人學英語, 讀莎士比亞, 是我們自願去讀的。西方的情況也是如此, 當他們自己有這樣的意願的時候, 他們就會主動地來了解中國。這個過程也同樣需要時間, 說到底還是要看中國自身在未來的發展如何。發展得愈好,

整個情形就會改變得愈好, 如果再發生甚麼動亂、再搞個甚麼「文化大革命」, 那就完蛋了。

□ 您的學術研究與寫作常常涉及不同的論題, 但其內在邏輯或立場卻是非常堅定的, 即反對任何脫離具體語境去抽象地強調差異或類同的做法。您對漢學家的批評是否也同樣適用於部分中國學者?

◆ 某些漢學家錯誤的根本之處在於把中國看成西方的一個絕對的對立面, 中國的一些學者確實也是如此。比如過世不久的季羨林先生, 他曾對我很好, 我也很尊重他, 但他的一些觀點帶有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 我是不同意的。季先生經常說中國人的傳統思想是「天人合一」, 與自然保持和諧的關係; 而西方人則是「人定勝天」, 依靠強力來征服自然, 所以現代的各種環境問題都是由西方人造成的。因此, 他認為只有依靠東方的智慧才能解決西方的現代性問題。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對的, 其實也是把東西方絕對地對立起來了。季先生講「天人合一」, 卻完全不考慮這種觀念在歷史上, 尤其在漢代由董仲舒提出來的時候, 其具體內涵到底是甚麼。另外, 他似乎並不了解西方在中世紀甚至在文藝復興之後, 思想觀念中也有很多與「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相似的觀點。

中西對立的觀點的害處在於他們把這種差異絕對化了, 其實這樣不但無助於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 反而是增加了對立。現在的中國比以前真是好得太多了, 正在逐漸地增強力量, 在這個時候我們尤

正是政治、經濟力量上的不平衡造成了中西文化上的不平衡。我們願意了解西方和西方的現實, 而一般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 還是凝固在過去的、老舊的、異國情調的中國。

其不能自以為是地宣稱——「我們中國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將來是我們的世紀」等諸如此類的口號。現在很多中國人好像突然覺得只有我們可以解救全世界似的，這是不對的，我們的學者尤其不能如此。這種心情其實是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自信或盲目自信的表現，可中國帶有這種情緒的人還不少。

□ 可能這也與中國傳統的天下觀有點聯繫，把中國當成天下的中心，這種想法現在似乎又開始膨脹了。

◆ 在晚清的時候這種觀念就已經被認為是不對的了。薛福成當時就說過，「中國乃世界之中國，非天下之中國」^⑤。現在都二十一世紀了，我們很多人的認識、眼界還達不到這位晚清官員的水準，實在是悲哀。

□ 國內學界其實需要更多的像您這樣來自體制之外的學者的批評，大家都和和氣氣、共享太平，對學術而言不是件甚麼好事。

◆ 我覺得學術上有不同意見和看法，就應該提出來爭論而不需要害怕甚麼。只是這些年我對國內其他領域的學者的著作看得比較少，有時看了也不知道他們在講些甚麼，哈哈……我對一些人的批評純粹是出於學理上的對話目的，而不是為了攻擊誰，更不是為了證明自己高明。我們應該對我們不贊成的觀點做出適當的回應，如果它們是有意義的話，我們就應該這樣去做。就像錢鍾書講「易之三名」，本來是講《周易》，為甚麼還要把黑格爾（Georg W. F. Hegel）批評一頓呢？

因為不這樣的話，別人就會說：「你引用的那些西方的資料，根本就是與中國文學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所以他必須要建立一個論證的基礎，要立就要有破，道理就在這裏。批評的目的不是要與別人爭長短，就像孟子說的：「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⑥批評了黑格爾，並不因此就否定一切，也並不減少我們對黑格爾這位哲學家的敬佩。

註釋

① 杜甫：《旅夜書懷》，載張忠綱選注：《杜甫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11；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20。

② 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在威斯敏斯特橋上》，載華茲華斯著，黃杲炘譯：《華茲華斯抒情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頁227。具體關於此問題的論述亦可參見張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第六章，「自然、文字與中國詩研究」。

③ Zhang Longxi, "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a* 19, no. 1 (1993): 71-101.

④ Nicole Mones, "Op-Ed Essay on China", *Washington Post*, 27 July 2008.

⑤ 筆者查閱資料之後發現最先發表類似觀點的中國人應該是梁啟超。參見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11-12。

⑥ 楊伯峻：《孟子譯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154。

中西對立的觀點的害處在於他們把這種差異絕對化了，這樣不但無助於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反而是增加了對立。現在很多中國人好像突然覺得只有我們可以解救全世界似的，這是不對的，學者尤其不能如此。